社會組

一位抗日志士的訃聞

優選

溫芃萱

一

訃聞左上角的一元郵票上印著「莊敬自強」四個字，郵戳的日期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發信地點爲大湖。收件人是這位抗日志士遺族裏一位從小就常常帶著堂兄弟們自行搭著客運下車後再爬上一段半小時山路去探望他及小祖母的直系孫子。

有別於喪宅的地址，左下方與喪宅並列的聯絡處是「大湖鄉公所兵役課」，電話爲「大湖三號」，除了訃聞還附上一張「抗日志士溫洪江老先生行略」，撰文者爲「抗日志士溫洪江老先生治喪委員會」，裡面寫下了關於這位溫洪江老先生的簡略生平與其抗日的事蹟和其爲黨爲國之忠貞行爲和爲人處事，並無特別的歌功頌德卻平實的記錄下這位抗日志士的品格與其一生堅持的信念—忠黨、愛國、守護這塊土地並且以身作則。

資訊發達的現代，只要上網查詢幾乎都能找到想要找尋的相關資料，搜尋了這位抗日志士的名字後，得到的結果是—大湖武裝抗暴事件溫洪江、林華梅、李木芳、邱阿妹、彭德貴遭到檢舉被捕。時間爲昭和七年也就是西元一九三二年，地點爲苗栗縣大湖鄉，編者爲「大湖鄉誌編纂委員會」在大湖鄉誌裡的其中一則簡要記載，這些都列在一個名爲「臺灣大事紀要」的欄目之下，沒有再多的相關記錄了。

這位抗日志士溫老先生，出生於清光緒十四年，（西元一八八八年）當時的臺灣仍舊是在大清帝國的時代，童年時期就讀私塾並熱愛且精通漢學，因此日據時期曾任私塾教師多年。推算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之時爲西元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可想而知，童年時代倏地被迫變成日本殖民文化下的受害者，腦中早已熟悉的漢學思想和精神及身爲客家人的背景，卻在一夕之間要完全被剔除，變身爲口說日文、行動上還要表現出如日本皇民那般喊著「天皇萬歲」的無知與愚蠢，對於始祖從廣東來臺定居已經二十世的他，看在眼裡不僅心痛難過更是悲憤，因此所謂的「日帝劣政」讓其索性放棄教職而矢志從事抗日活動。開始顛沛流離、四處逃難最後難逃被監禁二年後又被判刑六年的結果，但是釋放後仍不改其志，繼續抗日行動，始終爲黨國奮戰犧牲到底。

一張黑白色的大頭照以粗劣的木質裱框掛在三合院正廳堂的斑駁牆壁上，照片裡的老人戴著一副黑框眼鏡，沒有特別表情的他，倒是顯出一股讀書人的老學究味兒，有別於牆上其他親人在黑白照裡臉上掛著一絲淡淡的微笑，他的大頭照是靦腆的，奇特的是與他並排掛著的不是其妻們，是臺灣人熟知的抗日烈士—羅福星！保守傳統的客家宅院裡的正廳堂中，竟掛著一張看似外國臉孔的大頭照，與其生活中心的大家長同時被所有後輩們一同奉祀著，若讓不知緣由的人看到肯定會一頭霧

上的中央山脈一直矗立在島上守護這塊寶島一樣。

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後，溫老先生曾任大湖區黨部小組長，爾後擔任大湖忠烈祠管理員等職務，那時候已經逐漸步入老年的他，身旁相伴的不是元配妻子而是第三任的妻子。四處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一共有三個妻子，元配克盡長媳的職責與新竹老家的公婆相互照顧、並且持續與子女日夜勤於農事及生活；第二任妻子爲其生下三子後，因病早逝，因此有了第三任妻子，第三任妻子毫無私心，視其爲自己親生兒子般，認眞照顧這些母親早亡的孩子們，只生下一女的她，便不再生育，只以家庭平安和樂爲主。

沒有宮廷小說或是大戶人家裡妻妾成群互相爭權奪利的戲碼，更沒有大房或二房彼此忌妒而私下互鬥的情節，元配妻兒與仍在世的老母親之後也隨著溫老先生在大湖鄉定居後，從新竹老家搬遷至苗栗四份這個山腰小村落，雖然彼此分住二處，但仍舊保持聯繫，住在四份的老母親與元配及子女們在此重新落地生根，依舊務農，老母親年紀雖大仍操持家務看顧曾孫們，長年不在家的緣故，使得溫老先生後來與元配家庭維持如同親人，但一年之中只有水覺得組合很怪異。

訃聞經過了四十一年的保存，雖然收件人沒有刻意的用高級文件夾收藏它，只是簡簡單單地與其他同時代的某些重要信件一同保存著；訃聞的紙質隨著年代久遠及氣候悶熱潮濕，因此變黃甚至有些地方呈現淺褐色，但是訃聞上印刷的標楷黑字罕見地無任何褪色！訃聞也無被蟲啃蝕的痕跡，只有中間的褶痕稍稍被撕裂一半，好似當年的發文者以黨國的精神一直守護著它，訃聞的亡者也以他自己一貫地「硬頸」客家人個性，表現在這最後的人生一幕。

抗日志士的遺族們後來都怎麼樣了呢？「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故事一直在歷史裡重複上演著。電視劇裡也都這麼播放，人們看了總是大快人心也加深道德觀念的重要性。事實是：當年被日特追捕後被殺、被關或是被迫而降日的先人們，即使在對日抗戰成功後也沒有因此就成爲英雄，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安靜且默默地爲臺灣這塊土地奉獻一己之力，並無任何想要邀功行賞之心，因爲忠黨愛國的精神早已深植在全身血液裡，尤其是日寇在殖民時期以其「自我優越意識」的方式殘暴地統治著生活在這片島嶼的所有人時，造成臺灣島民不分族群、不分親疏一致同仇敵愾的抗日精神，只爲了保護守住自己的文化、語言與傳統價值觀。

這位訃聞的亡者，即是衆多抗日分子之一例，因著年輕時期就矢志抗日，先是參加當年的蔡清琳先生領導的革命組織，發動了北埔事件而被日人圍捕時，不得不從原本的家鄉—新竹關西逃至苗栗大湖，在大湖又持續參與當地的抗日組織，追隨領導人郭常先生之後，在民國十六年三月間因事機洩漏被日特查獲捕送新竹監禁兩年，嗣解台北被判徒刑六年。

身爲家中獨子的他，沒有機會在家盡孝，所幸父母皆大力支持其志向，協力照看家中的妻兒子女，雖然他身爲當時少數的知識份子，但是因爲長年在外四處參與抗日組織的各個活動，因而不得不與家人分開而住，爲的是不願牽連家人親族，以及能夠隨時配合黨的行動，無人知曉的箇中酸楚是他的子女們幾乎皆爲文盲不識字，日據時代所以無法接受漢學教育，因爲家貧更不可能去學校接受日式教育，所有孩子都只能在家協助務農，他的長女更因爲先天性雙眼全盲而終身未嫁，只得與其母親相伴在家幫忙家務，客家人的勤奮傳統是—只要有地能種就不會餓死；有工作就能活下去，這樣的固守與堅持，是這位抗日志士即使在外冒著生命危險從事與日方抗爭時的背後靠山，就如同臺灣島嶼

逢年過節回來一或二次的探訪，與親生的子女們也不甚相熟，所幸他的三位妻子所生的子女們彼此手足之間互動良好、感情融洽、相處愉快時常聯繫，元配與第三任妻子也毫無芥蒂都視對方爲家人。

大湖忠烈祠管理員一職，應是黨國給予這位抗日志士的一份退而不休的職務，與其身分相當、更符合他一生抗日之精神，守護著先人及當年同袍戰友們的遺骨，他的存在就是一份象徵，當地仕紳及黨員們皆對其尊崇有加，又因爲他早年曾爲私塾教師的身分、儒家思想及客家人的背景，即使臺灣光復、對日抗戰勝利後，黨部曾想嘉許回饋他部分農田家產或金錢，以補貼慰勞他一生忠貞愛國愛黨的行動，他仍堅持婉拒，秉持其「清廉」的個人守則，平淡過日，閒暇時就讀書看戲，從不過問亦不干涉後輩子女們的生活，只要求他們一切「胼手胝足」靠自己的雙手過活。

從他的子女們身上看到的是生活的清貧，四份老家無論老少，無一人閒晃，自家後院養雞鴨鵝，種田外還種香茅，焚燒製成精油後賣給批發商出口到國外，剩下的廢草再變成肥料，每寸土地使其地盡其利，每份看似已成廢物的東西務必使其物盡其用，傍晚時山腰上裊裊升起的縷縷白煙，帶著一些木柴碳化焚燒的味道，農家的滋味融入飄來的清風，餐桌上絕不會出現山珍海味，是簡單的一或二道葉菜及客家醃製品，魚啊肉類等都得留在過年或掃墓時才能端上桌的。

甲午戰爭的失敗，臺灣及澎湖等島嶼被割讓給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更促使日人自我優越意識抬頭，認爲其日皇的施政與國家政策更優於我中華民族，用這樣的心態佔據臺灣及澎湖島時，更是極盡鄙視之能事來看待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認爲原住民爲「番人」，用在臺灣各地插上日本國旗的可笑動作，就自以爲這寶島瞬間沿伸爲日本國的一部分，殊不知人心是無法從改變外在的事物而輕易跟著變化的；文化及傳統思想更不是貼公告強力宣導或是改變外在穿著就會消滅的；日本的皇民化精神與臺灣島上的中華文化思想根本上就不相同，可想而知，當時的知識分子如何能夠吞忍下被所謂「倭寇」、「日寇」當成下等階層的統治！

現代的臺灣，在亞洲國家裡面不再是當年日軍底下的殖民地，取而代之的卻是日本人眼中美麗又溫暖的寶島，臺灣這片土地即使在日據時代被摧殘殆盡，但是韌性十足的臺灣，怎麼可能因此就消失而變成另一個自始至終、根本上就不同種不同源的國家之延伸？歷史成爲文字，部分記錄在紙本上，有些存留在人們的腦海某一區塊，另一部分則由著老口傳給下一代，共同的一點就是：這是一頁臺灣土地的血淚史、臺灣某些人的辛酸史、也是受害者家屬痛苦的回憶史。

持續住在臺灣島上的人們，並非健忘也不是遺忘，只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就是「以德報怨」，即使那時的日人殖民時代下，許多所謂「人神共憤」的事情一再發生，但是仍舊不是一無可取的，現今的總統府就是日式建築，卻依然雄偉壯麗挺立在首都台北市中心，臺灣在日據時代出生長大的孩子們，後來接受日式教育在社會裡成爲中高階精英分子的也不在少數，這就說明中華文化五千多年來，一貫地「兼容並蓄」原則是包容異族文化並給予尊重，也不吝於傳授教導給其他民族。

日本國土處於頻繁的地震帶，臺灣在好幾年前給予日本人的災後救援及捐款，讓日人對於這塊曾是「延伸日本國」土地的臺灣有了更多不同的情感，不再是那種想要佔爲己有的自私，而是眞心被臺灣人們感動的心情，因爲不計前嫌的臺灣，是在他們正處於危急時刻，竟能拋下曾經被壓迫、被殖民的恥辱而伸出援手募款、給予精神上、經濟上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援的貴人。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也有透過國際人道

組織救援團體協助某些貧困國家中，需要幫助的窮苦及弱勢人類，但是臺灣對曾經迫害自己的日本國，還能自發性的全國一起動員，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去救援的作爲，絕不是一般國家能輕易做到的，也是日人（包含當今日本明仁天皇）迄今仍然念茲在茲的感動事件。

抗日志士溫老先生的後輩們在政治、經濟或社會上，並沒有任何出類拔萃的大人物，有的只是平凡樸實的客家子弟延續他一貫地低調、清苦與廉潔精神，也因此曾孫們之中好幾位是憲兵、海軍陸戰隊及特種蛙人部隊，家世清白無任何前科或犯罪紀錄，才能勝任以上軍種，想必衆人皆知，雖然這些事情都是在溫老先生亡故十多年後才出現，家族裡也未曾有人將這些事情與溫老先生當年的抗日事蹟相提並論，畢竟年代久遠且後輩曾孫根本無人與他多有接觸，但是血液裡的基因是不會改變的，在遺傳學上，雖然經過幾代的繁衍偶爾會有些染色體上的變異，但是目前爲止，後代子孫仍安分的生活著。

二

三個多月前，父親偶然在他老舊到幾乎可以報廢的辦公桌抽屜一角，找到幾張老照片，說老也還好，畢竟還是彩色照片，一共有十一張，但是裡面沒有我與弟弟，也沒有我其他堂姊們，只有出現幾位年紀較長的堂哥，照片裡都是我的叔叔、伯伯、爺爺、奶奶和一位伯母，還有幾位叔公，當然也有我父親及母親，那是掃墓時候拍的，照片上沒有顯示日期，不過看看當時照片裡的人們模樣，這顯示這至少是二十年以前的照片，父親看了其中一張說：「這張照片裡四個人已經死了三個！」我接過來仔細端詳，他說的是我的祖父跟叔公們，其他張照片我也反覆細看，最後父親說統統給我，因爲這個年代不時興相片簿了！連七十歲的父親都習慣使用年輕世代愛用的「蘋果咬一口」手機，對於這些相片，他反而不知道該擺放在何處。

我用簡單的信封袋裝好帶回家，睡前在書桌前打開桌燈，再一次審視這十一張相片，裡面的都是我的親人們，不諱言的是—的確如父親所言，甚至相片裡面的其他人有一半都死了！除了祖父母及叔公們這些因年老過世之外，二伯、堂叔、堂伯母及叔婆，皆因意外及疾病而早逝，望著他們的身影，覺得時間好像暫時停住，就像鬧鐘沒電時指針就停著不動，在我的記憶裡其實就是這樣，他們的身形及臉孔模樣甚至服飾，講話時特有的客家腔調，未曾隨著時間的巨輪輾碎我的記憶，無法磨滅的是身爲這個大家族的一份子、因爲有了他們才創造了我！在成年以前，每年回故鄉時特有的歡笑與愉快的回憶。

曾祖父在我父親結婚前一年驟逝，身體一向硬朗的他，據說是因爲意外的跌倒造成雙腿不良於行，回老家休養二個月即過世，享壽八十有九。所以母親當然沒有見過他本人，曾祖母更早以前即逝世，母親見過的就是他們口中的小祖母（曾祖父的第三任妻子），人很和善慈藹，疼愛父親及伯父叔叔和衆堂叔們，當然也包含祖父輩們、姑婆們。

這些都不在我的回憶裡，有記憶的時候所謂的曾祖母或是姑婆們都不在老家了，應該是都已過世或即使有回來探望也是「相見不相識」，隨著父親一年回來老家過年及掃墓各一次，我和弟弟變成「不會說和聽的客家人」，從出生到長大求學等一直都在中南部居住的我們，父親不僅沒有時間教會我們說客家話，他自己還講了一口地道的閩南話，每年回到苗栗鄉下的我們就變成半個聾啞人，跟祖父母、其他叔公婆們總是雞同鴨講，然後比手畫腳，最後就是—微笑是共同的語言。

老家的三合院石柱上面刻印著山西太原堂，但小時候明明記得祖籍是廣東省，父

親不怎麼了解只是含糊解釋我們的客家血統可能就是來自山西省太原市，我怎麼也想不通因爲看著中國大陸的地圖，山西省跟廣東省實在差太遠，但是我依舊記住了我們是山西太原堂的客家人，上了小學後開始有社會課之後的某一天，我突然發覺爲何課本上的某個大頭照也曾出現在我們苗栗老家的山西太原堂？原來他就是羅福星烈士！可是這個外國人跟我們客家人又什麼關係呢？

從那時候發現這件事後，每年過年回去三合院，我的眼睛盯著上頭那二張黑白大頭照看著，一直想這二人怎麼會有連結與交集？還是像傳統一樣，那個戒嚴的時代教室前後總要掛著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及故總統蔣中正先生的遺像？許多的問號在小小的腦袋裡轉啊轉的，就是沒勇氣問出口，連客家話都不會說跟聽了怎麼問呢！

慢慢地年紀漸長，跟父親聊起這個問題才知道，原來曾祖父曾是抗日志士，所以也認識羅福星烈士並成爲好友，但是家族裡面從來不曾有任何人提起這些事情，兩張大頭照眞的就像制式化的遺像並排掛在牆上，永遠都不會掉下來似的像兩個另類門神，我們這個家族就是這樣的平淡平凡，無任何可向人說嘴的事物，從小到大的話題都是問幾歲了，媽媽呢？弟弟呢？或是問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畢竟我能聽的有限能回答的更有限，放眼望去，親友們總是忙碌著，即使是過年仍不改其平日該做的農務，掃雞舍、煮食十幾個人份量的飯菜、手洗所有衣物及醃製酸菜等，滿布裂紋的雙手及齲牙咧嘴的笑容，客家精髓就在此細節裡，曾祖父不願意後代們因著白白得來的財產或是土地而破壞了客家人根深柢固在骨子裡的簡樸性格，所以拒絕了當年國家及黨原意要贈予給他的「獎勵」，以表彰他過往的「功績」。

另一個直到最近才知道的事情是，原來曾祖父因爲抗日分子的敏感身分到處逃竄躲藏，雖然最後仍舊被日特圍捕而被關了前後一共八年，出來後仍舊不改其志繼續參加抗日活動，因此跟祖父這邊大房的家庭關係比較淡，祖父成長的過程幾乎是沒有曾祖父的參與，他們與母親及祖父的爺爺奶奶一起度過。

不過父親倒是跟他的祖父（亦即我的曾祖父）感情不錯，據父親描述，他常搭客運到大湖忠烈祠找他的祖父及小祖母，每次帶著堂弟們一起去，都會得到熱情的招待，異於家裡一向不變的簡樸菜色，祖父跟小祖母總是端出最豐盛的美味佳餚，父親說桌上總是有魚有肉，而且那邊很大可以跑來跑去玩耍，任忠烈祠管理員時，有配給宿舍給他們倆老，然後晚上父親就會跟著他們去戲院看戲吃小吃，那是生活中唯一的享受與樂趣，畢竟老家三合院裡沒有這些娛樂，有的就是做不完的農務與家事，所以父親說即使搭客運到了大湖下車後還要再走上半小時以上的山坡路，幾個男孩子們也甘之如飴，去找他們的祖父，就是在那清苦又貧困的日子中偷閒的機會。

我跟曾祖父的連結永遠都是那張黑白大頭照，無法親身參與到父親口沫橫飛地講到當年去找他的祖父時那個神采飛揚的模樣，卻能在腦中繪出一幅爺爺奶奶帶著幾個小孫子們邊聊天、邊開心去看戲的溫馨畫面。當我手中握著這張變色又變質的訃聞時，小時候看到的黑白大頭照很清晰的在腦中浮現出來，原來我一直都記得他，雖然我們不曾有過任何交集與接觸，可是這份訃聞卻是他留給我的最棒的禮物，讓不曾親身參與那個年代的我及「對日抗戰總是在課本上」的印象具體化了！

曾祖父的喪禮由他的治喪委員會置辦，並非由家裡的人，代表於黨及國來說，他的確是有功在國家，但是實際上讓我引以爲傲的是，他並沒有因爲「有功在身」而趁機在臺灣光復後邀功行賞，得到任何財物或土地及特權，相反地，是隱沒在一個無活人的忠烈祠以管理員身分一職盡忠職

守，堅守一生清廉及讀書人的性格，即使他知道妻兒子女們都過著辛苦的窮困生活也不改其堅毅的個性，要生活、要吃飯，就要靠自己工作，辛苦得來的才是甘甜醇美的滋味。

治喪委員會所撰寫的行略上有著一段文字—老先生品德高尚，思想純正，對人謙和誠懇，做事光明磊落，遵守公共德道，行爲正直、言論誠實、見義勇爲，樂善好施頗爲人欽敬，歷年接受黨政機關表揚，計有中央黨部、臺灣省黨部、省政府、省議會、苗栗縣黨部、縣政府、縣議會、大湖鄉公所等頒發獎狀、獎品、匾額不勝枚舉。我拿著這個問父親：「有獎狀嗎？有獎品嗎？從來沒看到匾額耶！」

父親也不知道這些物品在哪兒？細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元配（即父親的祖母、曾祖父的大房妻子）這裡的三合院從來都沒有放這些獎狀獎品或匾額，我追問那放在哪？父親猜想可能放在其他子女們的家或是倉庫之類，父親也不曾看見過，即使是在忠烈祠的宿舍裡也沒有這些物品。

人類壽命本就有限，但是國家是一直存在的，因爲國家的存在，所以才保障了一代又一代的子子孫孫，想到曾祖父捨下私塾教師這樣的身分，去當一名抗日分子，過上顛沛流離還要被圍捕監禁的生活，不爲財不爲名，那爲的又是什麼？換成是我，我做得到嗎？夜深人靜時我面對著他的訃聞一遍又一遍盯著看，就像小時候眼睛直直盯著他的大頭遺照看，心裡卻問了一個自己回答不出來的問題，現代的人們大多自顧不暇、貪生怕死，做事先問是否有利可圖有名可沾，處在亞洲堪稱最自由的國度裡，卻一再地自我矮化國家地位及諷刺嘲弄自己選票中所選出來的領導人。

曾祖父一定從來不曾想過這麼複雜的問題吧！在他心裡一定只想著要守護這片土地，抵抗外侮以及保家衛國，不輕易向日人低頭，捍衛中華文化及精神，不然爲何可以過上安穩的日子與父母妻兒好好守著家園的事不幹，偏要走上抗日這條拿生命去拚的路？

羅福星烈士也一樣，他是文人後代，爲國捐軀時才二十幾歲，身後留下稚兒及妻女，但是先後從廣東來臺灣多次，爲的就是這片土地、這塊寶島，不願它落入外國人手裡成爲殖民地屬國。前人的奮戰精神隨著現在的優渥舒適生活，日漸地被後人淡化遺忘，無人再被感動，只是因爲列在教科書上因此記住，但是更多的是沒有被列在書上或是甚至沒有留下任何記錄的爲國犧牲的先民們。

臺灣的土地之美，在幾年前藉由日前不幸墜機的齊柏林導演記錄了下來，看得見的可以藉由攝影機記錄拍攝保存下來，但是看不見的呢？精神與文化是看不見的，又隱又晦的悄悄改變中，以前常見的國軍電影現在也幾乎消失不見，幾年前還在電視上常常播放的招募軍官影片也漸漸不再流行，許多的傳統會式微不是沒有原由，人們的目光開始追逐由其他國家藉由影像戲劇所帶來的文化，不需要再有槍砲子彈的硬仗要打，軟實力的加強或許才是現今更急迫的。

今年是77抗戰八十週年，但是媒體新聞似乎都不怎麼報導，我對著曾祖父的訃聞跟他說聲「阿祖（只會說臺語），辛苦了！」我看著舊照片裡他的墓碑對他敬禮，心裡默默對他感懷謝恩，幸好有他及當年的那些犧牲的先人們，也謝謝他一直持守自己的原則到死，因爲我不會遺忘這個歷史與家族史，也會一直支持這塊我生長的土地、寶島—臺灣。

謹以此文感念所有爲著臺灣付出的先民先祖們，無論是我的曾祖父或是相關的抗日志士及組織，謝謝你們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無論是犧牲了生命或是流血流汗，都因爲有了這樣的合作造就了臺灣曾有的最輝煌的年代與歷史；臺灣的美的確不是只有土地還有人，這些人也不只是現在活著的人，也包含了你們及其壯烈的精神，謝謝你們！